

在理想與現實之間： 香港中文大學的教學經歷

前言

我和香港中文大學結緣，早在1970年，在歷史系擔任講師一年半，三十年後(2004)又回到中大，教了16年，終於在2020年退休。這一段漫長的教學經驗，是和我在香港的生活經驗分不開的：從短期訪問到長期居留，最後變成香港永久居民。這本書「對話篇」部分的訪談者張歷君和中大的淵源更深，他曾是我的學生，如今是同行，我們切磋學問多年，他向我提出七個事先準備好的書面問題，我的回答就是這一章的內容。

- (1) 老師1970年夏天首次來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您選擇香港作為您教學生涯的起點——和終點？
- (2) 老師當年在香港文壇和文化界中有不少朋友，可否請您談談當年與文壇朋友的交往以及相關的文化活動？

- (3) 1970年是冷戰時期的中段，香港處於東西方和左右兩派之間的夾縫，想必是「文化冷戰」的重要角力場。可否請老師談談您當年的所見所聞？
- (4) 當年的香港中文大學大師如雲，老師可否談談您對這些學界老前輩的印象？我也很想多了解當年校園中的學術氣氛和課堂教學的情況。
- (5) 老師二千年代再次回到中大任教，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您回到香港來，並再次選擇中大作為您這次的落腳點？
- (6) 在老師看來，七十年代的中大與二千年代的中大有何異同之處？對您來說，兩個不同年代的香港是否有著不同的意義？
- (7) 二千年代以後，我一直都在選修或旁聽老師的課。老師的課堂對我最大的啟發是跨學科、跨地域和跨文化的比較研究視野。老師的教學打破了中大體制既有的學科專業藩籬，並探索和實驗跨學科以至數位人文的各種可能性。個人覺得，這是老師留給中大最好的禮物。我很好奇，老師這些年來是否有意為中大開闢這個獨特的學術交流空間？您對中大人文學科的發展有沒有特別的想法和寄望？

以上是張歷君提出的問題，都饒有意義，也令我從頭回憶和反思我和中大的因緣。畢竟我在此任教，前後有十八年之久，超過在美國教過的任何一間大學。關於第一次任教（1970年8月至1971年12月）的經驗，我曾於中大五十週年校慶的

時候，受中文系之邀寫了一篇文章，名為〈追憶中大的似水年華〉，¹全文稍加修正，爰引於後，作為本章的第一部分。

似水年華的時代：初到中大（1970—1971）

1970年夏，我初抵中文大學任教，職位是歷史系講師。我剛剛拿到博士學位，在美國達特茅斯學院任講師，並把哈佛的博士論文完成，因為簽證問題必須離開美國。恰好此時有一個「哈佛燕京學社」撥款設在中大的講師職位從缺，於是我輕易地申請到了，1970年夏，我輕裝就道，先在歐洲遨遊，中大秋季快開學前，才抵達香港。

在此之前，我從未來過香港。記得當時有一位台大外文系的老同學葉維廉在中大客座，竟然在他的一本文集中公開呼籲我離開美國回到華人地區的香港來共同為中國文化的前途效力。這一個「海妖的呼喚」（Siren's call）對我的確有點魔力，機會難得，也從未想到香港還是英國的殖民地，大多數人說的是陌生的廣東話，就那麼來了。對於這個號稱「東方之珠」的國際大都會我一無所知，只認得兩個老同學：劉紹銘和戴天，紹銘時在中大英文系任教，已經成家立業，為我這個海外浪子提供一個暫時的家，給我一種安全感。

記得第一天到了中大校園（當時只有崇基和范克廉樓），放下行李，就隨紹銘和宗教系的同事沈宣仁教授驅車從馬料水直落尖沙咀，到香港酒店去飲英式下午茶。途經窩打老道，看到這個街牌，英文名是 Waterloo Road，中文名變成了「窩打老道」，幾乎笑出聲來——怎麼會譯成這個不倫不類的

名字？從車窗望去，路邊一排排的洋房和店鋪頗有點「異國情調」，不禁心曠神怡，就在那一瞬間，我愛上了香港，這一個華洋雜處、充滿矛盾的小島正合我的口味。

旅美浸淫西潮多年，心中似有「回頭是岸」的感覺，因此我把剛出版的第一本雜文集定名為《西潮的彼岸》。然而思想依然西化，甚至有點左傾，略帶反殖民的情緒，我熱烈支持「中文法定」運動，認為這是一件天經地義的原則，覺得在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為中華文化而奮鬥，更有意義。香港對我而言就是一片自由樂土，既無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又在共產黨的「鐵幕」之外，還有哪一個華人地區比香港更自由？於是，我變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自由主義者，在統治者的眼中我當然不是良民，但又不是一个顛覆社會安定的「革命分子」，雖然一度有此嫌疑，因為我寫了一篇批評中大制度不公平的文章，竟然引起軒然巨波，鬧得滿校風雨。

思想自由是我堅信不疑的基本價值，在學院裡更應如此。於是，在我講授的中國近代史課上，我故意使用三本觀點毫不相同的教科書：一是我在哈佛的老師費正清寫的，一是台灣學者（記得是李守孔）寫的，一是中共的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的著作；三本書的政治立場各異，我讓學生展開辯論，不亦樂乎。我講課時當然用國語（當時在香港尚無「普通話」這個名詞），學生給我一個綽號：「北京猿人」——「北京」指的當然是我的標準北京官話，「猿人」呢？我自認是恭維的名詞，因為我軀體雄偉，比一般學生——特別是女學生——高得多。

因為年歲相差無幾（我剛過三十歲），在課堂上我和學生打成一片，毫無隔閡。講課時看他們的表情，彷彿似懂非懂，也可能是膽怯，於是我進一步誇下海口說：「三個月內我要學會用廣東話講課，但你們也必須學會用國語參加討論！」這場賭注我險勝：三個月後，我竟然用蹩腳的粵語公開演講，題目是關於知識分子和現代化的問題，我的觀點完全出自金耀基先生剛出版的一本同名的書。²我一口氣用廣東話講了二十多分鐘，最後在學生一片笑聲中還是改用國語講完。但是在課堂上，學生依然故我，本來會講國語的發言比較踴躍，講廣東話的依然保持沉默。

記得當時學生可以隨意跨系選課，所以我班上也有哲學系和中文系的學生，因此有幸教到幾位高足：本系的二年級本科生洪長泰，思想成熟，在《崇基學生報》上寫長文評點美國各著名大學的漢學研究，絕對是可造之才，畢業後順理成章進入哈佛攻讀研究院，卓然有成，後來成了香港科技大學的名教授，現已退休。關子尹是哲學系勞思光教授的得意門生，也來選我的課，又是一個天生的深思型學者，後來到德國留學，拿到博士後回母校擔任哲學系教授，後任系主任職位，也已退休。另一位新亞的學生郭少棠選過我的「俄國近代史」的課，他旅美學成歸國後回母校任教，曾被選為文學院的院長，現已退休。2013年時任中大文學院院長梁元生也是我當年學生中的佼佼者，我剛開課不久，他就以學生會會長的身分邀請我公開演講魯迅，後來我把講稿寫成長文在《明報月刊》發表，³就此走向魯迅研究的不歸路。

現在回想起來，我自己的學問其實並不紮實，但教學熱情，思想較為新穎，所以頗得學生愛戴。記得我第一年教的是中國近代史，第二年教的是中西交通史。文史哲不分家，我不自覺地用了不少文學資料，更偏重思想史和文化史。崇基歷史系的老師不多，大家相處無間，系主任是羅球慶教授，人極熱情，對我這個後生小子十分照顧；還有一位來自美國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的Lorantas教授，⁴我私下叫他「獨眼龍」，因為他一隻眼戴了黑眼罩。另一位屬於聯合書院的王德昭教授更是一位翩翩君子，我有時會向他請教。新亞的中文系和歷史系則大師如雲，我只有在三院歷史教授聯席會議上見過面，談不上深交。在會上我的工作只是口頭傳譯，最難纏的反而是一位不學無術但熱衷權力的美國老教授(姑隱其名)，他老是在會上問我：“What did they say?”生怕這幾位新亞的史學大師發言對他不利，其實他們何嘗把他看在眼裡？

當時中大正處於整合的時期：崇基、新亞、聯合三院合併為一間大學。我個人反對全盤整合，認為各院應該獨立，但可以聯合成像牛津和劍橋形式的大學；然而大勢所趨，我這種自由主義的教育模式當然和中大受命成立的構想大相徑庭。我最敬仰的是新亞的傳統和精神，也覺得崇基背後的基督教教育理念有其歷史傳統，可以追溯到清華和燕京。現在反思，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理想主義，而且基於我對中國教育傳統的理解：既然名叫「中文大學」，就應該和殖民主義的香港大學模式截然不同。我在課堂上和課外與學生交談時，都是討論大問題，例如中國文化的前途、在香港作為現代知識分子的責任等等。外在的政治環境當然有影響，但當時

香港的左右派的文化角力是公開的，我和雙方都保持友誼關係。然而學院內自成一個「社區」(community)，和外界保持距離，至少我自己在教導學生時，鼓勵他們超越目前的政治局限，現在依然如此。理想主義的壞處是不切實際，但也有好處，就是可以高瞻遠矚，尋求將來的願景。校園是一個最「理想式」的社區，是一群甘願犧牲物質享受和名利而熱心教育的「知識人」組成的。這一套思想本身也是一種教育的理想主義，然而我至今堅信不移。只不過面對當今功利至上的官僚主義操作模式，顯得不「與時並進」了，然而沒有理想和願景的教育制度，到底其辦學的目的又何在？

當年的中大，就是建立在一種理想上，每個人對理想或有不同見解和爭論，然而那畢竟還是一個理想的年代。追憶昔時的似水年華，當然不免把過去也理想化了，但是具體地說，當年的中大校園生活還是值得懷念的。七十年代初的新界正在發展，但還保持鄉村的純樸風貌。我的廣東話就是有時到附近鄉村買菜購日用品時和村婦交談學來的，在大學火車站買車票時也順便學兩句，清掃我們辦公的大樓(早已不存在)的工友更是我和劉紹銘的朋友。我住在基督教職員宿舍的一棟小公寓(現在依然「健在」)，和美國女友可以到吐露港划船，向敬仰的老同事如勞思光先生請教時，則到山上的一家西餐廳雍雅山房喝咖啡。總之，對我來說這一個中大就是一個樂園，我在此如魚得水，樂不思蜀，根本不想再回美國任教。然而偏偏有一天收到普林斯頓大學一位教授的一封信，請我到該校任教。我不想走，反而幾位老友勸我走，我被說動了，1972年初，還剩下一學期就匆匆離港，我的那門中西

交通史的課程，由三位老友代課：胡菊人、戴天、胡金銓，可謂是「頂尖明星陣容」，校方竟然不聞不問，這種自由尺度，在今日中大難以想像。我至今對崇基校長容啟東先生心存感激，他對我的容忍態度來自何處？基督徒的寬恕心？當年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榜樣？我不得而知。當然不少中大高層人士聽說我要走了，也暗自高興。

這一段個人回憶，只能算是我個人心路歷程的一小部分。因為今年(2013)適逢中大建校五十週年紀念。中文系向我約稿，遂成此篇。

冷戰時期的中大

以上的這篇文章只約略提到一個引人爭議的細節：就是我和中大第一任校長李卓敏的爭執，為此還寫了一篇文章：〈我對於香港中文大學的觀感〉，曾收入我最早的一本雜文集《西潮的彼岸》。當時我完全沒有料到，文章在《南北極》雜誌及《中大學生報》刊出後，引起風波，我竟然也被學生視為「革命領袖」。⁵如今重讀這篇舊文，實在有明日黃花之感。文中對李校長的確批評得很厲害，有點「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氣勢，但出發點並不牽涉個人恩怨，而是對中大的不同理念。李校長的任務就是把三個學院——新亞、崇基、聯合——統一為一間大學，而非如我想像的英國的牛津和劍橋大學一樣，每個學院相對獨立，也各有獨立傳統和學風。我剛來到中大的時候，雖然屬於崇基學院，但受到新亞精神的感召，希望把在美國讀書八年的經驗獻給它，所以較喜歡這個英國

模式，而不願把美國的「龐然大學」(multi-university) 的模式帶進中大。如今看來是我「誤判」了，全世界的大學似乎都走向美國模式：特別是制度化和官僚化——韋伯(Max Weber)所謂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而且變本加厲，把大學辦得猶如資本主義的大公司。除此之外，這篇舊文所提到一些殖民制度下的不公平待遇(教授分為兩等，有「海外待遇」和「本地待遇」)如今都已經不存在了。

上面引述的回憶文章由於篇幅和主題所限，沒有仔細探討中大建校的精神和五十年來——如今已經是六十年了——的傳統。我聽友人說：中大有兩個傳統，一個是官僚制度的傳統，和所有香港的大學一樣，符合政府要求，統一運作，在國際上爭取學術優秀(excellence)的排名，鼓勵同仁申請政府的「大學撥款委員會」(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簡稱UGC，我曾在該組織屬下的研究資助局[Research Grants Council, RGC]擔任評審委員五年)；另一方面，有所謂「中大人」的「江湖」傳統，他們關心社會，有自己的理想，要做香港文化的「江湖」俠客，為人民請命，不願到政府做高官，因此有人認為中大人就是「搗亂分子」。就我個人而言，當然傾向後者的傳統，但不是搗亂分子，而中大校方也從來沒有干涉我在課內和課外的任何行為。從1970年開始，我就是一個活躍於學院內外的「兩棲動物」，教學和研究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當年嚮往的是做一個知識分子和文化人，而不是一個專業的教書匠。在我任講師的一年半中，有一半的時間花在文化活動，因為我一到香港就經由老友劉紹銘和戴天介紹認識了《明報月刊》的主編胡菊人，在他鼓勵之下，開始為《明月》和其他文